

S H E N G M I N G G E

方越 著

生命之根

(上 册)

三 秦 出 版 社

生命之根

(上册)

方越著

三秦出版社
2002年3月

生命之根(自序)

正是“秋风生渭水，落叶满长安”的季节，我将像片片飞叶一样的文字，选集成册，循着“落叶归根”的情结，奉献给我的生命之根。

书之付印，我十分感念朋友、编辑、同事以及我的学生们。但我最感激的还是生我、养我、育我的母亲。这些笔墨，点点滴滴浸润着母亲的泪情。鲁迅说过：“健康的神经，应该与慈母之心与赤子之心相连。”此言道出了写作的真谛。

(一)

母亲带我到这个人世，我就哭了，母亲也哭了。那是1941年(己巳年，民国30年)12月30日(农历11月13日)的隆冬季节。在扶风县北部明月山下晁留村一个农民家的土坑上，我是靠母亲的体温，暖暖和和过冬的……

记不清依偎在母亲怀里，吮吸乳汁的甜美、幸福与安宁，记得住母亲在晚上，黄土屋、黄土坑上彻夜纺线、缝衣的身影，记得住母亲白天迈着小脚，在黄土地里艰难劳作的情景，记得住母亲为了我成长常常流泪的凄楚与悲凉……

泪水是心血化成的，是心灵的涌泉，是情感的物化表达，点点滴滴进我的心田；泪珠是软弱无力的，但却具有强大的穿透力、浸润力，如同灼烫的钢水，在我心灵的“照壁”打下深深的

烙印，淬出了一个文弱书生笔锋的硬度。

我是母亲第一个儿子。在很冷酷很森严的封建家长制覆盖的大家庭环境中，我是母亲的一个骄傲与希望，也是她能挺直腰杆笑对贫穷的一个支点。因此，我在母亲的怀里依偎得最多，最多。到了断奶的时候，母亲还常常用柿子汁喂我，更加疼我、护我。到了上学的时候，比我大一岁半的姐姐为她兴高采烈地缝制了一个小书包，并兴致勃勃地向叔辈们要来纸和笔，跑到村小学报了名。中午回来，母亲却怎么也不让她去上学了，说家里穷，只能供我一个上学，让姐姐在家帮她照管小弟弟小妹妹。姐姐仍执意要去上学念书，母亲见劝说不成，就把她的书包扔在架在半空的箱盖上，姐姐急得哭了。母亲见姐姐可怜巴巴的样子，长叹一声，也簌然落泪了。眼泪，成了让姐姐放弃上学念头的最好语言。

初小四年，我是在村子一座大庙改成的“学校”度过的。土坯垒的课桌凳，常常把本来破旧的衣服蹭满尘土。但当我唱着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……”回到家里，母亲总是高兴地为我拍打身上的尘土，并用热水揩净我手上的墨迹。把一个桑仁或小枣放在我嘴里……高小两年需到离家七里远的天度镇上完全小学去就读，母亲让我吃住在离学校二里远的舅父家。一直寡居凄惶无助的外婆，日夜纺线织布，换来粮食糊口；舅父经常半夜起来，步行几里去深山打柴。担一百斤的柴，赶到天度镇卖钱，以补家用。母亲每念外婆的可怜和舅父的辛劳，常常落泪。那泪珠是对外婆和舅父的感激与礼赞。

中学时代，与其他农村穷苦学生一样，是每周背馍上学的……

1962年，我带着一脸菜色读完了高中考大学。考虑到家境贫寒，我选择了国家包学费、包生活费的陕西师范大学。高

考录取通知书送到当时的扶风县天度人民公社，在穷乡僻壤，还真产生了不小的轰动。人们纷纷传颂县北乡出了一个“大秀才”。但对我和父亲，却不全是喜讯。父亲连通知书看也不看，苦楚着脸说：“咱家穷，你姊妹多，哪有钱供你上大学。与其上了大学仍当教书先生，不如现在就到公社的学校教书，挣工分去。”当时，公社曾招考民办教师，我考了第一名，已被录取了。我的心也在上大学与当民办教师之间的选择中犹豫。母亲却坚定地说，“人老几辈，就考了书印（我的乳名）一个大學生，还是叫娃念大学去吧！”父亲阴沉着脸，一声接一声“算了算了，不要念了！”母亲急了，一下子涌出泪水，哭泣着诉说：“书印身体不行，在家里下不了苦。那怕咱们少吃点、少穿点，家里少使费点，一定要让娃念大学！……叫别的娃不再念书了，回来挣工分！”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能这样断然的决定，可怜的母亲也一定说不清楚供我一人上大学，对家庭、对父母、对弟妹、对我个人都意味着什么，但在她万般伤神、万般悲郁的决定里，寄托着一个母亲含辛茹苦的期盼，一个母亲成就儿子心愿与前程的善心和责任。这——，只有母亲心血化成的泪水知道。是母亲的泪水，软化了父亲磨难成茧的心，改写了我一生的命运！

我后面有四个弟弟、两个妹妹，为了供我一个上学，他们都和姐姐一样，或没上学，或中途辍学，从小在家做农活。家境的贫寒和农活的艰辛，弟妹们正在发育的体格怎么支持得住？两个弟弟先后背着父母，报名当兵去了。母亲知道后，站在村口远望，流了许多盼儿回家的泪。尽管部队上管吃管穿，生活比农村好，对家里也减轻了负担，但母亲总牵挂着儿子。那慈母对游子思念的精神劳累，要比她日夜劳作更为辛酸得多。那泪水不仅是思念，是忧伤，而且是一种悲壮，一种对儿

子命运的担忧与企盼。

母亲的泪水,是情感充沛的力量之源,是对命运抗争的无声宣言,是牺牲其她子女上学权利成就她长子前程的痛苦抉择所酝酿的苦水;是母亲刚强做人的追求和人生价值观的一种本能的表达。

从母亲身上,我获得了自立自强,情钟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心理基调。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四年,物质上缺吃少穿,生活窘迫,但精神上异常丰富,无比充实。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和全国先进青年一样,在党的思想教育下,虔诚的忠诚组织,崇拜英模,渴望为国奉献,追求大公无私、舍己为人的崇高境界。雷锋、焦裕禄、王进喜和赵梦桃、邢燕子等劳动英雄,成为心中的偶像,对他们的伟大事迹和不凡语言,耳熟能详。在我心中,这些人物的精神与我母亲的情感是那么一致,那么戚息与共。一读他们的文字,一看他们的图片,我的情绪就无比激动,心潮澎湃。是母亲做人的勇气和力量、成事的意志和毅力、以及母亲一样的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人物构成了我的感情、性格、人生价值观的基础框架,内化成我全部的人生精髓。对大学教学所安排的课程,要求背诵、熟读的 500 篇古代诗词、100 篇古代散文,阅读 100 部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的任务,我都出色完成。星期天大多是在图书馆或教室度过的。做这样的苦功,全都是为了母亲含泪的心愿。

我知道,姐姐、妹妹、弟弟都没能上学,既是命运的不公,也是父母面对贫困所作的无奈而理智的选择:与其都困在家里苦熬,不如成全其中一个。让姊妹们对我形成了一个众星捧月之势。对此,我只能百倍地发愤努力,奋发图强。“母亲”、“劳动”、“英雄”、“模范”、“共产党人”一直是潜流我心底的同一形象,构成我心灵的万里“情”波……

几十年以后的实践证明,姐妹们的智力并不比我差,如果他们有机会和条件上学,肯定比我更有出息。大弟巨书贤当了7年兵,学了“侦察兵的全能”,是“特等射手”。转业到兴平化肥厂,由工人干到车间副主任,靠的是精通全厂蛛网般的管道和心脏般的动力设备的维修技术,并将自己在长期实践中的经验,写成6篇论文,2篇被刊登在化工部主办的《中氮肥》杂志上,4篇登在《兴化科技》上,成为青工技术人员学习的教材。三弟巨书海,当兵5年,凭忠诚和苦干入党,转业回农村,在乡上当电工、文化干事,一手搞乡镇上的事务,一手种地务农。他给乡镇、县上写过不少文章,近百篇作品,发表在多家报刊和几种诗集里,并6次获奖,1994年10月、11月前后,分别被吸收为宝鸡市作家协会会员,宝鸡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。《一部无字句声明》在纪念建国50周年全国诗歌散文大赛中获得二等奖。其文学才情显然在我之上。姐姐和妹妹虽粗识文字,而培养其儿子们都成为当代有出息的大学生。由此可见,母亲遗传给我们的生命基因是多么健康与聪慧……

(二)

1960年,带着抚养8个儿女的劳碌,倔犟地走在三年“自然灾害”之中的母亲,被贫病交夹击倒了,被送进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。那是母亲第一次进大城市,也是母亲最后一次在大城市住过。手术出院后,父亲叫了一辆三轮车,拉母亲在西安钟楼绕了一圈,算是游览了古城,就匆匆上了回家的火车。一家人感激人民医院救了母亲的命,感谢人民政府为母亲豁免了全部医疗费。出于生命本色的感恩戴德,母亲

让父亲买了一幅毛主席像，回到家里，端端正正贴在她房间。天天望着毛主席像，自言自语：“多亏有了毛主席……”话未出口，泪先涌出。父母还常常念叨，我们家穷，是毛主席共产党搞土改时，给我们家分了土地、分了牛。是毛主席共产党用助学金供我娃上学……朴实无华的语言，情笃意切的泪水，像热血灌注在我的心里，像圣水化为我的灵魂。母亲的热泪，变成了我一生情感的底色，思维的主线，语言的基调，文化的心理，左右、支配了我一生的思想和言行。我每当拿起笔来写作，身后仿佛站着母亲的神灵，眼前仿佛闪动着母亲的泪光，让我把她的情感化为一种崇高的信仰，一种纯净的精神，一种执着的劳动人民的意识；让我把她对党、对毛主席、对祖国和人民的质朴的爱，化为一种理想主义，一种丰沛的激情；化为一种情系平民百姓的忧患意识，锻造成一个沉重的精神十字架，一直扛在肩头上。

那时，我正在扶风县上高中。教室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与母亲房间的一模一样。凝望那目光仿佛透彻人心的伟人像，心中总是激动不已。读书、写作、做事，从不敢懈怠。对课文中毛主席的著作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愚公移山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反对自由主义》、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、《别了司徒雷登》等篇章，读起来分外有劲；对毛主席的诗词更是爱不释手，词不离口，让自己的心身浸润在毛泽东的思想、情感、学识、文采和气质里。勤工俭学，参加背铁矿劳动，仿效其气势，写出“今日矿石背下山，明日铁牛开进村”的诗句，被刊登在县报上。中学时代，学校让我负责编辑学生小报，常常在煤油灯下，用窄窄的钢板，铺上蜡纸，用铁笔“吱吱”地刻着、画着；用油墨一张张印刷；一张张发到各班同学手中。经常忙得顾不上休息，但心里却以实践毛泽东思想而乐滋滋的，常常兴奋不已。就在

这种默默劳作中,我爱上了文科,爱上了写作。正如一首诗所写:“活着 / 泥土给我生命的琼浆 / 洒下汗水 / 把她打扮 // 死后 / 泥土给我永恒的归宿 / 留下诗歌 / 把她颂扬……”

(三)

1965年9月25日(农历九月初一),我正在西安市女中参加城市“社教运动”的实践,下午正开会,噩耗传来,母亲突然去逝了!那天傍晚,秋雨特别大。我冒雨赶火车,只嫌火车跑得慢。在扶风绛帐车站下火车,眼前一片苍茫茫的路,白亮亮的雨帘。我不顾一切的疾步爬坡赶路,仿佛得到母亲灵魂的召唤,我从密不透风的玉米地穿过,抄小路向家小跑……这是我上大学以来,步行赶火车走了多少趟的70里路,却在泥泞中走了一夜,到家时已是凌晨5时许,见到母亲像劳累之后熟睡一样,白皙的面庞,十分安详。我撕心裂肺,放声大哭,声声“妈呀,妈呀”的呼喊,怎么也叫不醒妈妈了,永远地叫不醒了……长跪在母亲的棺前,我才痛切地感到“隔世之感”是怎么个滋味……后来,我才知道,母亲在舅舅家伺奉久病的外婆,外婆病逝后,她为外婆洗头、洗脚、穿衣,料理一毕,去灵前哭几声外婆,就昏了过去……亲属们安慰我们,“你妈是跟你婆去了”,“到那边孝顺自己的母亲去了……”母亲出殡那天,是大雨后放晴,全村老少都哭了。母亲离开我们时,才仅仅41岁啊!没有留下一张照片,没有留下一句遗言,没有享儿女一天的伺奉,尤其没有享我这个上大学儿子的一点点“荣华富贵”……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悲痛和遗憾。对此,我没有其他选择,只能把绵绵的思念,化为隐隐地怨愤和悠悠的情怀,像母亲那样去劳作、那样去做人;像母亲那样去爱憎、那样去

善良。以求感应和对接我母亲的在天之灵！

为了母亲那份人间最美好的感情，我大学毕业后，走了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，受了人世纷纷扰扰的艰苦磨难，经历了数不清的缘起缘灭，但唯有文字缘没有消散，一生相随。

1966—1969年，我与几个老师和同学合作，创作了话剧《直罗镇》，在省内几个地市公演60多场。1969—1973年，在庆安公司六厂当工人、厂宣传干事；1974—1983年，在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当秘书、写作组组长；下放长安县农村搞社会调查、劳动锻炼；下放西安人民搪瓷厂当宣传干事、工人文化课教员。其间，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数量不少的文章，夜以继日，飞纸走笔，为市委和市委领导起草过不少文件和讲话稿。

1983—1993年，在西安市第二中学当语文教师。在讲台上给学生讲鲁迅的《祝福》，讲叶圣陶的《夜》等作品，我讲着讲着不由自主地进入人物情境，与学生一齐哭了起来——那是我油然想起了母亲的辛劳与命运，母亲的情怀与伟大。我把这样一种感情，转化成另一种写作的形式——用口播文字，表情达意。课余写与语文教学有关的随笔、论文。其中《试论作文教学的主体意识——叶圣陶作文教学思想浅探》获全国中学语文研究会一等奖，被叶至善领导的全国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中心聘为副秘书长、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语文学会聘为秘书长。与同行同道合作编著的《高考作文得失例谈》、《中学生学习法》等六种教学参考书出版发行。“写作”的主要形式是在讲坛上“口播”，先后在省内外200多所中学为师生作过高考作文辅导报告，为电大、职大的学生带过写作课。讲台十几年，桃李满古城；弟子填其室，烛光一条心——我一直视为人生一乐。

1993—1994年在《城市金融报》担任副刊编辑记者，与陈

忠实、贾平凹、京夫、赵熙、毛锜等名家交往多起来。陈忠实为我题写“钟情文学不悔以至终”；贾平凹题写“海风山骨，雪瀑精神”；毛锜给我题写“特行独立，风霜自挾”；赵熙给我题写“寂径跋涉苦，书诗天地宽”；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王巨才，书写王冕的诗赠我：“我家洗砚池边树，朵朵开花淡墨痕，不教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在人间。”我自慰自忖，这些既是对我的鼓励，也是对我的追求与向往的一种概缩。

1993年11月，我被批准加入西安市作家协会。

1994年4月，我被批准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。

1994—1996年，被西安日报社聘为理论评论部编辑、记者，在辅带三位新闻新手和改编大量稿件的同时，我操持笔墨，为都市的文明和百姓的幸福而呐喊。正如我在1994年3月5日日记中写道，“东风唤春归，发我心中华。沥血呕心几沉浮，人间哀乐总牵挂。道是文为心声，言为情苗，真情不参假，依理据实说真实！”我从事报纸高强度、快节奏、广领域、多学科的文字工作，精神、情感的根本依据，是母亲传递给我的一生做好人的思想基因。我在我的生日——“母难之日”分外想念母亲。在一篇生日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誓愿：“我的一切是母亲给的，我要把我的一切奉献给同母亲一样可爱可敬的普通劳动人民。为他们的疾苦与委屈而鸣不平，为他们的生存与利益而奔走呼号！母亲的爱，是我生命永不息灭的火焰；母亲的情结，是我为人作文做事的精神支柱；为了千千万万个母亲，是我自力行世的奋斗目标和力量源泉。”因此，在我写的文章中，情感的投射和对世道人心的判断力，都源于母亲的泪光。

在西安日报社理论部工作了3年，报社给做了这样的鉴定：

巨德印(笔名方越)原系市委办公厅干部,后在市二中当教师。1993年12月经社委会研究聘为《西安日报》社理论评论部记者、编辑,在报社工作两年多来,各方面表现不错。能自觉学习党的理论、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维护党的工作大局,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。协助总编和理论部策划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典型报导、调查报告、系列评论和理论宣传相结合的宣传活动,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。敬业精神强,不计时间和报酬,常常骑自行车奔波,工作投入,责任心强,能遵守新闻纪律和报社各项规章制度。编、采、写能力都较高。近三年来,共撰写社论、评论员文章、通讯报道、小言论等文章300多篇,其中获奖6项,受到省、市有关部门领导和读者好评。在理论部成立之初,能协助总编热心辅导新手,以身作则,使理论部整体素质提高较快,工作成效高。1995年理论部被评为全市“理论学习和宣传先进集体”,分别受到市委和省委宣传部的表彰,这与他的努力分不开。

社长王长安在“鉴定”上签名批道:“方越同志在报社聘任期间表现属实。”总编辑马师雄签名批道:“情况属实。方越同志在报社工作三年来,工作努力,成绩非常突出。”

1997年我被陕西日报社财贸部聘任为编辑、记者。2001年陕西日报社财贸部给我做了鉴定:

巨德印(笔名方越、肖磊等)1997年2月聘任为陕西日报财贸部记者、编辑至今。四年多来,该同志自觉学习党的理论、路线、方针政策,维护党的工作大局,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认识水平;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和使命感。能遵守新闻纪律,把握好新闻导向。先后协助部门策划了几次大型典型报导、调查报告、热点分析、系列述评等重点宣传,并撰写了数十篇评论和编者按,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。事业心重,工作吃

苦,作风踏实,责任心强,不计时间和报酬。采访深入扎实,认真刻苦,能按要求完成各项采、编、写的任务。敬业精神强,职业道德好,为人正派朴实,乐于帮助、辅导年轻新手,克己奉公,甘当普通一员。文字能力强,文风严谨,思考比较独到。撰写 200 多篇社论、评论员文章、随笔、杂文、通讯、典型报道、综述、新闻评论等文章,其中获全国、省级各类奖 8 项,受到报社领导和读者的好评。多次给一些行业和单位的干部、文秘人员、通讯员培训班讲课,受到欢迎。

总编辑杜耀峰在报社编前会上说,“方越写的评论有新意,有激情。思想成熟,文笔成熟。省委书记李建国给报社打电话表扬《聚时代精神,壮三秦气魄》写得有气势,有思考,有文彩,写得很好。”

这两个报社的“鉴定”,把一个新闻从业者诚实的劳动以及应该具有的思想、人格、责任感和社会良知,给予肯定,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心理安慰。可惜,这些不能念给我的母亲听,如果母亲听了,她老人家一定会破泣为笑。她的泪水没有白流,她用泪水支持儿子上大学的抉择,多么具有“远见卓识”。尽管她一字不识,尽管她不知道儿子选择以文字为职业意味着什么,但她那颗慈母之心,足以忧深思远,达天接地……

(四)

在母亲的生命意识里,把吃苦受累留给自己,把对其他子女愧疚留给自己,而把进城上大学的难得机会全给了我,把读书成才的前途与希望寄托给我。尽管她再也没有离开过那贫寒的农家,尽管她不知道让儿子走进大城市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,也不知道什么叫“为党为国供养一个大学生”,并

对她的人生有什么意义,但她那颗掏肝挖肺也要成全儿子的心,那串串滴水穿石般与命运抗争的泪水,整整温暖、激励了我一生,整整洗涤、滋养了我一生,孵化成为我一生泉涌相报的不尽笔墨……

——母亲吃苦耐劳、任劳任怨、舍己为人的品格,是我立世的骨骼。她教我怎么活着,怎样做人……

——母亲不怕困难、坚韧不屈、重名节而轻生死的精神,是我事业的灵魂。她教我正直清白,奋斗不息……

——母亲深明恩义、敬重领袖的信仰,是我读书写作的价值导向。她教我体悟到一个普通人生闪现的崇高与伟大……

——母亲的泪光,化为我生命的云霓,有了云霓在空,我的内心才产生电闪雷鸣,才成为我笔下的沥沥雨霖……

——母亲的善良之心,慈悲之泪,给了我思想的激情、思维的理性和思考的力度。有了母亲的情感酵母,我只要一见“农民”、“劳工”、“劳苦大众”、“打工仔”、“劳动者”这样的字眼,我的泪泉就会悄然涌动。采写史翠云、陈秀芝、王霞云、宋利利、沈瑞谨、邓菊梅等普通劳动者时,都不由自主地把对她们事迹的感动和对母亲的敬仰之情交感融通,写作的语言只要与母亲的情感会心,就异常灵动。

母亲的爱,是青山,是大地,是河流,是阳光,是空气,是土壤,是生命的本源,是人生的根基,是永恒的厚德流光。这种博大的母爱,像一个巨大的强力磁场,我就是寓于其中的转子,一生都在这磁场中旋转,不时产生出“电流”、“电火花”、“电击声”,产生出母爱传导的力……这种无私的母爱,给了我爱憎、喜怒、忧虑的情绪,整整缠绕了我一生的思想情结。至今,我一看到“扶贫”、“公平”、“反腐”、“正义”、“雇工剥削与劳动权益”、“民主与法制”等之类的题材,就不由自主的睁大了

眼睛,扬起了眉梢。母亲的爱,让我从学校到社会,一直关注善事,嫉恨丑恶;母亲的情感让我从读书到写作,察世道之变,究人心之本,寓贫民意识于胸怀,措真言实语于笔端。我撰写的社论、评论、随笔、杂文、通讯等等,使用的是祖先留下的文字符号,其所承传的如母亲那样的思想、情绪、意愿,才是它负载的生命。

母亲的爱,是我终生的精神家园。她守望着我漫长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,她守护着我屈冤累累伤痕斑斑的心灵。有了母爱的守望和守护,我才能在历经社会变动、世事纷扰、人事沉浮的屡次打击与事故中,走过炼狱,步入涅槃……保持与时俱进,不辍赶路,让人生在苦难中挺立,在平凡中奋争,在劳碌中充实,自始至终自强不息。是的——母亲在我心中是伟岸的峭石,我只是她的一根向往太阳的苦藤,离开了母亲的关爱与守护,我可能只会在地上匍匐。母亲用乳汁、心血、汗水与泪泉塑造了我,我用一枯一绿的奋进与呐喊,回应母爱的家园……

(五)

正如花草树木都有自己的生命之根,母亲是我的生命之根,是我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、政治生命与事业生命之根。

我倔强地奉行鲁迅一句名言为信条:“野薊在受到致命的摧折之后,还要开一朵小花。”我说,那是因为根还活着,根在不朽!

文字工作者的一切,都归于文字,正像草木之荣枯归于叶子。这本书,是我从大学毕业以来,几乎天天都飞墨走笔,从无以计数的文字稿中抽选的新近部分。万分感谢三秦出版社

社长兼总编辑魏全瑞、编辑部主任张招贤等友人，鼓励我把它集纳出版，我才得以将它作为对母亲的一束回报。

“巨德印，‘大德之印证也’……”不仅我的躯体与灵魂得之于父母，而且我的乳名与学名也得之于父母。回头看人生，名字竟成谶语：“书之付印”成为天地之大德、父母之大德、人道之大德的印证。生命之根是大德之继也——仅以此书，献给我的父亲、母亲，献给为了我上学而辍学、终生吃苦受累的姐姐弟弟妹妹们。

方 越

2001年9月28日于陕西日报社

时事留声

我提倡“把言论当诗写。”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——就是最好的时事评论。

我写言论追求“真理与美文的结合”。二者的关系似灵与肉，像飞与翼。

知道真理的人和运用真理认识、解决新问题的人，是不同的。犹如水库与水电站的区别。水本身没有能量，运动才产生能量。

新闻评论，逐时事而扬真理。诗情与文彩越丰富，真理飞翔得越高、越远。

静水无声，流水有声。跌宕越大，其声越大。